

#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sup>\*</sup>

解 垚 李 敏

**【摘 要】**文章基于 2012~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面板固定效应、DID、PSM-DID 模型对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进行研究,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个体志向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公共转移支付能有效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水平,且该扶志效应在长期更加突出。(2)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改善家庭消费水平、资产水平等经济福利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个体志向,也可以通过提高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程度等主观福利发挥扶志效应。(3)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存在异质性,一是与民生性转移支付相比,生产性转移支付具有更强的扶志效应;二是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低收入群体、青年和老年群体、女性群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群体的志向水平;三是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突出,与农村地区相比,公共转移支付更能提高城市地区政策靶向群体的个体志向。因此,只有进一步完善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结构和制度设计,加强政策的落实和监督,改善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才能充分发挥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关键词】**政府公共转移支付 扶志效应 PSM-DID 内在机制

**【作 者】**解 垚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 敏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各项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同时,中国未来的贫困治理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党的十九大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起脱贫志气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长效脱贫的关键。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许多贫困户虽然已达到脱贫标准,但仍存在脱贫意识不强、能力不够的问题。为了扶起脱贫志气以实现长效脱贫的目标,不仅要充分认识目前贫困人口的脱贫志气状况和影响脱贫志向的因素,了解已脱贫人口在巩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解决相对贫困的扶志扶智长效机制研究”(编号:20&ZD169)的阶段性成果。

固脱贫成果中存在的困难,更要充分把握现有扶贫政策在提振脱贫志气、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效脱贫中的作用与不足,为新时期贫困治理做好保障。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个体行为会受其意志的支配,若贫困个体具有较强的脱贫志向,可以有效促进贫困个体积极采取行动实现脱贫。一些贫困人群的悲观、风险厌恶等心理特征,不利于其通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改善贫困状态(洪名勇等,2018);另一些贫困人群则可能存在过度乐观的心理,容易产生福利依赖而陷入长期贫困,甚至加剧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有学者提出,只有充分解放贫困人口的思想,帮助贫困人口提升脱贫志向,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才能实现长效脱贫(张蓓,2017;张跃平、徐凯,2019;徐富明等,2017)。

一直以来,政府对私人的公共转移支付在消除绝对贫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直接提高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实现减贫目标(卢盛峰等,2018),也可以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改善卫生保健条件、增进个体主观福利、提升生产水平等间接实现减贫(边恕、张铭志,2021;韩华为、高琴,2018;田勇等,2019)。在减贫政策效应和减贫效率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公共转移支付具有较好的贫困瞄准性,减贫效率较高,有效缓解了贫困问题(苏春红、解垚,2015)。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不高(刘穷志,2010)。同时,一些针对公共转移支付减贫乏力原因的研究发现,经济周期、转移支付规模、覆盖率及瞄准性等是影响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减贫效应的主要因素(Bucheli,2016;边恕等,2020)。

总体来看,有关政府面向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其在减贫方面的政策效应和效率,但对公共转移支付在减贫过程中的扶志效应分析还有待完善,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对公共转移支付扶志的总体政策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进行分析,以期为人、因时、因地运用公共转移支付实现新的贫困治理目标提供有益的思考。

## 二、理论分析、数据与研究方法

### (一) 理论分析

志向水平是个体对自身未来发展的期望、目标和信念,根据贫困心理陷阱假说(Haushofer等,2014),贫困会引起个体产生负面情感和压力,降低个体的认知、意志力和自制力,从而使贫困人群陷入贫困陷阱,即贫困会造成个体志向低下并进一步强化贫困。贫困造成个体志向低下的原因,一是贫困会对个体造成直接的精神限制,贫困代表一种弱势,当个体意识到自身处于弱势地位时,会产生羞耻感、自卑、压力等心理负担,降低对自己未来的期望,且相对弱势的地位还会降低个体的社会信任程度,影响个体通过外界协助摆脱贫困的期望,使个体更易陷入长期贫困。二是贫困带来的经济和物质条件限

制会进一步降低个体志向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居民主观福利水平息息相关,且在贫困人口中尤为明显(Asadullah 等,2018)。根据马斯洛需求原理,贫困群体在物质方面的匮乏得到补偿后才有能力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目标。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均较低,在难以满足自身衣食住行等基础性消费的情况下,更无力通过医疗教育等发展性消费提升自身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能力,且较强的经济约束使穷人无法通过投资获得收益进而改善自身生活,增强其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水平的无力感和压力,导致其生活幸福感低下,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减弱,形成较低的志向水平。

针对贫困状态下个体志向低下的成因,政府面向私人的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保障贫困、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增强个体追求美好生活和未来的信心,提升个体志向水平。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机制(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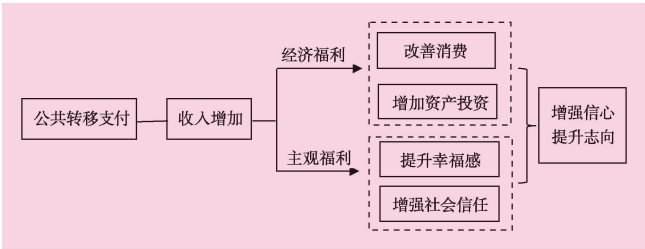


图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扶志理论分析

一是经济福利机制。政府对私人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可以改善外部经济和物质条件对低收入群体发展的限制。经济约束的放宽可以使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的消费得到有效改善,满足低收入群体在衣食住行等基础性消费方面的需求,改善其生活质量,也可以进一步实现低收入群体在医疗、文教娱乐等发展性消费方面的需求,丰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活动,改善其消费结构,进一步提升其改善自身生活的期望和信心。同时,经济约束的放宽也可以为贫困人群的投资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解决因投资乏力带来的志向不足问题。例如,农业补助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增加农户用于购买良种、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资金,促进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投资,帮助农户提高农业产出,增强其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来提高收入,进而实现更高生活目标的期望和信心,实现扶志的效果。

二是主观福利机制。政府对私人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可以改善贫困群体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主观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其因受经济限制陷入弱势地位而带来的改善生活的无力感、自卑感等负面心理,为其带来主观上的幸福感,提高其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增强政策靶向群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政府的积极救助也会增强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对政府、社会的信任,提高其通过积极参与政府的扶贫政策、借助邻里和社会其他主体的扶持救助改善自身生活的信心,进而提升个体通过自身努力来追求更高生活目标的志向水平。由于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往往存在认知水平不足、受教育程度较低、自制力和意志力较差的特征,无条件的政府公共转移支付也容易使其产生福利依

赖,降低其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追求更高生活目标的动力。因此,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的发挥取决于经济福利机制和主观福利机制的共同作用,有待实证检验。

### (二) 数据与研究方法

#### 1.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需要,本文采用 2012~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采用 PPS 抽样方法,通过追踪收集个体、家庭和社区 3 个层次的数据,构建了覆盖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若干区县的数据库,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样本有效性、代表性较强。根据关键变量对样本进行清理后,共获得居民个体样本 57 969 个。

#### 2.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由于个体志向是有序变量,同时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模型为:

$$aspiration_{it} = \alpha + \beta_1 transfer_{it} + \beta_2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P(aspiration_{it} = 1, 2, 3, 4, 5 | X) = \Phi(\gamma_1 transfer_{it} + \gamma_2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aspiration_{it}$  为个体志向水平,采用 CFPS 中“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度量,取值为 1~5,数值越大,志向水平越高。 $transfer_{it}$  是个体是否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虚拟变量,相应年份已获得为 1,否则为 0。 $X_{it}$  为影响个体志向水平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工作状态、是否有医保。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是否获得社会捐助、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家庭规模、非劳动力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家庭人均储蓄水平对数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地区特征方面对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控制。

为了消除不可观测变量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更好地评估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扶志效应,本文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进行重新估计。在具体操作时,以 2012 年为基期,2014~2018 年为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干预期,并保留 2012 年未获得任何公共转移支付的个体样本与 2014~2018 年个体样本进行匹配得到多期面板数据,将 2014~2018 年均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个体作为实验组,2012~2018 年均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个体作为对照组,具体模型为:

$$aspiration_{it} = \alpha + \beta_1 treat_{it} + \beta_2 post_t + \beta_3 treat_{it} \times post_t + \beta_4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treat_{it}$  为是否为实验组的虚拟变量,2014~2018 年均获得转移支付的个体为实验组,否则为对照组;  $post_t$  为政策实施期变量;  $\beta_3$  为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的大小。为保证样本在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前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PSM-DID)重新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进行再检验。



为探讨公共转移支付通过改善消费、增加资产投资、增强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发挥扶志效应的内在机制,本文借鉴石大千等(2018)的机制检验方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即:

$$Mediation_{it} = \alpha + c_1 treat_{it} + c_2 post_t + c_3 treat_{it} \times post_t + c_4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aspiration_{it} = \alpha + d_1 treat_{it} + d_2 post_t + d_3 treat_{it} \times post_t + d_4 Mediation_{it} + d_5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式(4)分析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式(5)将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变量与中介变量一同放入模型分析其对个体志向的影响。若  $c_3$  显著,且  $d_3$  比式(3)中  $\beta_3$  的大小或显著性有所降低,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中介变量主要包括经济福利机制变量和主观福利机制变量,其中经济福利机制变量主要包括除食品支出外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对数、家庭耐用消费品价值对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对数,主观福利机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程度。

### 三、实证分析

#### (一) 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的基本分析

表1给出了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志向的影响结果。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通过对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变量进行逐一控制后发现,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个体的志向高于未获得转移支付个体,且志向水平会随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而提高。采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后发现两个群体志向水平差异较为明显。模型5和模型6分别利用DID对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后,政策效应系数分别为0.132和0.339,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扶志净效应明显提升,表明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增强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提升个体志向水平。从经济福利看,公共转移支付在提高贫困和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基础上释放了其消费需求,为其基础性消费提供保障,改善其在物质方面的匮乏程度,为其发展性消费的释放提供可能,激发贫困人口对更高水平生活的向往,同时可以为低收入群体的生产投资提供保障,提高个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增强其通过发展生产提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动力及个体志向水平。从主观福利看,公共转移支付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对自身收入水平的主观感知,直接经济支持提升了个体收入水平,增强个体对自身的主观认同和主观福利水平,提升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激发个体志向。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志向水平有所提高,但这一效应在有序Logit模型中不明显。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积累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会增多,有利于增强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追求更高生活目标的期望;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对生活的宿命感会增强,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动力会下降。良好的健康水平、较高

表 1 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志向的影响

变 量	Fe			Ologit	DID(FE)	DID(Ologit)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是否获得转移支付	-0.026** (0.012)	0.038*** (0.012)	0.041*** (0.012)	0.039* (0.022)		
年 龄		0.061*** (0.002)	0.058*** (0.002)	-0.002* (0.001)	0.020*** (0.005)	-0.002 (0.002)
性 别		-0.082 (0.217)	-0.091 (0.217)	-0.049* (0.025)	-0.275 (0.206)	-0.037 (0.049)
健 康		0.120** (0.005)	0.119*** (0.005)	0.388*** (0.009)	0.122*** (0.010)	0.431*** (0.020)
受教育水平		-0.106*** (0.015)	-0.102*** (0.015)	-0.007 (0.011)	-0.053** (0.025)	-0.039** (0.019)
婚姻状况		0.003 (0.031)	0.006 (0.031)	0.269*** (0.036)	0.004 (0.051)	0.247*** (0.067)
工作状态		0.016 (0.015)	0.020 (0.015)	0.043* (0.026)	0.062** (0.026)	-0.013 (0.048)
医保状况		0.014 (0.019)	0.016 (0.019)	0.132*** (0.036)	-0.001 (0.030)	0.029 (0.060)
社会捐助			0.037 (0.048)	0.088 (0.096)	-0.025 (0.096)	-0.048 (0.220)
私人转移支付			-0.032** (0.013)	-0.149*** (0.025)	-0.020 (0.022)	-0.030 (0.048)
家庭规模			-0.010** (0.005)	-0.014** (0.006)	-0.011 (0.010)	-0.044*** (0.014)
非劳动力占比			0.118*** (0.030)	0.401*** (0.044)	0.034 (0.049)	0.234*** (0.078)
人均储蓄对数			-0.008*** (0.001)	-0.020*** (0.002)	-0.001 (0.002)	0.0004 (0.005)
人均收入对数			0.0005 (0.006)	0.153*** (0.010)	0.003 (0.011)	0.077*** (0.021)
城乡			0.087*** (0.024)	-0.072*** (0.026)	0.066 (0.051)	-0.113* (0.060)
东部地区			-0.175 (0.111)	0.037 (0.032)	-0.150 (0.157)	0.080 (0.072)
中部地区			0.040 (0.121)	0.154*** (0.032)	-0.064 (0.229)	0.176** (0.080)
常数项	3.957*** (0.006)	0.872*** (0.138)	1.073*** (0.162)		2.779*** (0.270)	
观测值	57980	57969	57969	57969	17631	17631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的收入水平会增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志向,因为身体健康的个体具有更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对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强个体的自我认同感,提升志向水平。处于已婚状态、拥有医保和工作会增强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信心,从而会提升个体的志向水平。获得社会捐助和私人转移支付不利于个体志向的提升,因为该类转移支付可能存在非持续性和福利依赖问题。从地区看,城乡居民间、中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居民间的志向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二) 基于 PSM-DID 的扶志效应再检验

为排除可观测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保证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实验组不存在显著差异以满足 DID 共同趋势的假设,本文利用 PSM 核匹配对样本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 DID 对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进行再检验。从表 2 可以看出,样本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匹配前和匹配后各变量的均值差异显著降低,样本能够较好地满足共同趋势假定。

在 PSM 的基础上,本文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 DID 对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进行再分析。由表 3 PSM-DID 核匹配结果可以看出,在排除可观测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后,与基础回归相比,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有所增强,表明在具有相似特征、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概率相近的个体间,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水平。通过更

换 PSM 匹配方法对样本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重新匹配后,从半径匹配和卡尺近邻匹配 DID 结果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志向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较为稳健。从长期效应模型中年份虚拟变量与实验组虚拟变量交互项系数的

表 2 PSM 各变量均值平衡性检验

变 量	匹配前			匹配后		
	实验组	对照组	t 值	实验组	对照组	t 值
年 龄	46.665	46.064	0.910	46.684	47.531	-1.030
性 别	0.464	0.473	-0.390	0.464	0.457	0.210
健 康	2.836	2.886	-1.000	2.836	2.692	1.960*
受教育水平	2.038	3.186	-18.610***	2.060	2.094	-0.500
婚姻状况	0.894	0.857	2.370**	0.897	0.890	0.400
工作状态	0.796	0.615	8.080***	0.787	0.814	-1.120
医保状况	0.927	0.806	6.920***	0.925	0.932	-0.440
社会捐助	0.005	0.002	1.690*	0.004	0.002	0.690
私人转移支付	0.185	0.164	1.220	0.187	0.190	-0.080
家庭规模	4.419	3.702	9.740***	4.411	4.295	0.930
非劳动力占比	0.232	0.232	0.000	0.234	0.225	0.600
人均储蓄对数	6.119	8.037	-16.570***	6.185	6.040	0.780
人均收入对数	8.417	9.460	-20.980***	8.478	8.518	-0.470
城乡	0.232	0.795	-30.350***	0.237	0.241	-0.140
东部地区	0.324	0.613	-13.090***	0.331	0.371	-1.390
中部地区	0.159	0.274	-5.760***	0.163	0.164	-0.04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PSM-DID)

变 量	核匹配	半径匹配	卡尺近邻匹配	长期效应(核匹配)
转移支付期	-0.133(0.104)	-0.197(0.135)	-0.332(0.465)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2.991*** (0.665)	3.384*** (0.794)	3.291*** (0.882)	
t2014×实验组				2.769*** (0.651)
t2016×实验组				2.473*** (0.816)
t2018×实验组				3.732*** (0.843)
常数项	1.184(1.359)	-0.067(1.749)	0.255(5.679)	-0.400(5.556)
观测值	16931	16915	5044	16931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精准扶贫政策前后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PSM-DID 核匹配)

变 量	精准扶贫政策前 (2010~2012 年)	精准扶贫政策后 (2016~2018 年)
转移支付期	0.036(0.116)	0.022(0.041)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0.008(0.033)	0.374*** (0.093)
常数项	1.227(2.577)	2.889*** (1.045)
观测值	39222	23556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看,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志向水平的积极影响随着政策实施时间增加有所增强,这说明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发挥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其原因可能是:(1)与短期经济扶持相比,长期稳定的经济扶持可以帮助贫困群体持续放宽经济约束,为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水平、进行

生产性投资提供持续的经济动力,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加稳定地增进经济福利,更好地增强政策靶向群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2)长期的公共转移支付具有更强的主观福利作用。由于个体会根据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若预期未来可以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支持,个体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投资以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更高,个体志向水平也将提高。

中国 2013 年提出精准扶贫,2014~2015 年该政策逐渐落地,这期间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可能会受到精准扶贫政策的冲击,因此,本文分别从精准扶贫政策前和政策后进行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明显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会受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精准扶贫政策前,公共转移支付的实施不尽完善,政策实施的不公平、福利依赖等问题对志向的消极影响占主导作用,使公共转移支付的经济福利和主观福利效应难以发挥,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得益于贫困户建档立卡和政策监督的增强,公共转移支付的瞄准性提高,政策公平性得到一定的保证,促进公共转移支付的经济福利和主观福利落到实处,进而促进扶志效应的提升。



四、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在短期和长期均能有效提升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水平,但其提升个体志向的内在机制需要深入探讨。前面提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经济福利机制和主观福利机制影响个体志向水平,下面将通过 PSM-DID 中介效应模型对以上机制进行检验。

表 5 给出了公共转移支付扶志的经济福利机制结果。首先,从公共转移支付通过提升政策靶向群体消费水平<sup>①</sup>进而提升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机制看,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提高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家庭日常设备与日用品等基础性消费支出,以及医疗、文教娱乐支出等发展性消费支出,改善家庭消费结构,放宽贫困对个体和家庭的物质消费限制,允许其在满足自身衣食住行等基础性消费的情况下,通过医疗教育等发展性消费提升自身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能力,这增强了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有利于激发其对更高层次需求的向往,表现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水平提高,个体志向水平提升。其次,从公共转移支付通过提升投资水平进而改善个体志向的机制作用看,公共转移支付可以在放宽经济约束的基础上,提高政策靶向群体对家庭

表 5 公共转移支付扶志的经济福利机制(PSM-DID)

变 量	消费机制		资产机制			
	人均消费支出	志向水平	耐用消费品价值	志向水平	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志向水平
转移支付期	0.006 (0.029)	0.598*** (0.041)	-0.114** (0.050)	0.598*** (0.039)	0.997*** (0.103)	0.599*** (0.039)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0.283*** (0.046)	0.319*** (0.123)	0.366*** (0.078)	0.324*** (0.119)	0.349** (0.146)	0.337*** (0.119)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0.032* (0.019)				
耐用消费品价值				0.031*** (0.009)		
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0.003 (0.005)
常数项	3.940*** (0.364)		0.483 (0.677)		7.947*** (1.105)	
观测值	16383	16383	16931	16931	16906	16906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① 这里的消费水平采用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对数,主要包括除食品支出外的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家庭日常设备与日用品等基础性消费支出,以及医疗、文化娱乐支出等发展性消费支出。

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解决其因资金不足而带来的生活改善乏力问题。对于贫困农户,农业补助等生产性转移支付为农户选育良种、购买农机具等提供经济保障,有利于改善贫困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增强其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改善自身生活的信心,提高其通过自身劳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家庭资产是财富水平的象征,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个体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认同感会增强,进而提升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追求,提高个体志向水平。

表6给出了公共转移支付扶志的主观福利机制结果。首先,从公共转移支付增强主观幸福感进而提升个体志向水平这一机制看(模型7和模型8),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提高志向水平。其次,从增进个体社会信任程度进而提升志向水平这一机制看(模型9和模型10),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个体在政策前后社会信任程度明显提升,个体志向水平也有所改善。

表6 公共转移支付扶志的主观福利机制(PSM-DID)

变 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7)	志向水平 (模型8)	社会信任 (模型9)	志向水平 (模型10)
实验组	-0.105(0.095)	-0.351*** (0.120)	-0.292** (0.117)	-0.355*** (0.123)
转移支付期	0.834*** (0.036)	0.264*** (0.040)	-0.177*** (0.043)	0.608*** (0.039)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0.173* (0.098)	0.294** (0.117)	0.350*** (0.111)	0.322*** (0.119)
主观幸福感		0.941*** (0.024)		
社会信任				0.093*** (0.035)
常数项			-0.543** (0.248)	
观测值	16931	16931	16910	16910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分析

(一) 不同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差异

本文将公共转移支付划分为以低保为代表的民生性转移支付和以农业补助为代表的生产性转移支付,从而探讨不同转移支付扶志效应的差异。由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仅2012和2014年披露了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具体类目,因此本文将采用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利用PSM-DID对两类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异质性进行检验。

从表7的结果看,生产性转移支付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个体志向水平。其内在原因主要是:(1)低保等民生性转移支付受众群体较小,政策监督不到位使其易受到人情关系、社会网络的影响而出现精英俘获、瞄准失误现象,影响政策公平性,不利于民生性公共转移支付提升政策靶向群体生活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程度,对于个体志向水平的正向

激励效应难以实现。(2)生产性转移支付具有普惠的特征,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户的形式降低了政策可操作性,政策公平性较高,有利于增强政策靶向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同时利用生产性公共转移支付进行生产性投资能够实现生产改善、收入增加、生产进一步改善的良性循环,具有“造血”功能,也有利于提高贫困群体的生产投入积极性和追求更高生活目标的志向。(3)民生性转移支付的政策靶向群体多为失去劳动能力的个体,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其脱贫志向严重不足,仅靠低规模的转移支付较难提升志向,且转移支付的无条件性更易造成福利依赖。

(二) 收入水平差异

本文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分析。在排除家庭收入水平对个体志向的客观影响后,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对家庭收入在 50%收入分位以下的个体志向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对 75%收入分位以上个体的志向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显著。与中高收入群体相比,政府转移支付的收入效应为低收入家庭所带来的福利感知更强。

(三) 个体特征差异

对于不同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的政策靶向群体,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存在差异。首先,本文将样本划分为青年(18~44岁)、中年(45~60岁)和老年(60岁以上)后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在青年、老年群体中的扶志效应明显高于中年群体,这可能是因为与中年人相比,青年群体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积累水平不足,家庭抚养和赡养负担较重,更加需要经济支持改善自身生活水平,而公共转移支付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从而缓解其生活负担和心理压力,增强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许多老年人没有持续的养老支持,公共转移支付可以为其提供持续稳定的经济来源,提升其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感,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其次,对比不同性别的样本后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对女性个

表 7 不同种类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志向的影响

变 量	生产性转移支付	民生性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期	0.584(0.412)	0.327*** (0.091)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2.143*** (0.341)	0.080(0.118)
常数项	14.411(9.427)	2.985*** (0.770)
观测值	19159	1142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8 不同收入分位数下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志向的影响(PSM-DID)

变 量	分位数			
	25%以下	25%~50%	50%~75%	75%以上
转移支付期	0.139(0.263)	-0.300(0.359)	-0.249(0.239)	-0.142*(0.085)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1.799*** (0.658)	6.646*** (1.985)	3.850(4.093)	11.477*(6.487)
常数项	8.115** (3.864)	-3.353(4.776)	-1.005(2.120)	3.167*** (1.217)
观测值	4038	4259	4412	4222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9 公共转移支付对不同年龄与性别个体志向的影响(PSM-DID)

变 量	青年	中年	老年	女性	男性
转移支付期	0.036(0.046)	0.044(0.063)	-0.097(0.107)	-0.054(0.147)	-0.219(0.149)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2.695*** (1.016)	1.442(1.035)	5.281*** (1.951)	4.709*** (1.005)	1.006(0.822)
常数项	2.852** (1.308)	0.400(3.635)	1.694(1.112)	0.713(2.286)	0.668(1.860)
观测值	6343	6067	4451	8967	7964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体的志向水平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经济地位较低,更容易受经济约束从而限制其追求更好生活的能力,公共转移支付可以为女性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女性的经济地位,放宽经济约束,增进经济福利,鼓励女性实现更多的消费和社交需求,缓解生活贫困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增进主观福利,提升志向水平。再次,根据不同受教育水平对样本进行划分后发现,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高高中、大专和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志向水平,对大学及以上学历个体的志向水平存在消极影响。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往往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更低的经济能力,其依靠自身努力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有限,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为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发展性支出提供可能,从而提振其追求更高水平生活的信心和志向。

(四) 地区差异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在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公共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居民的志向水平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更加健全,更有利于政策靶向群体利用公共转移支付提升自身消费和投资水平,进而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中西部地区政策靶向群体自身教育和认知水平较低,自然条件恶劣、环境闭塞、贫困集中连片的特征使其更易受贫困环境的影响而造成贫困文化根深蒂固,脱贫志向严重不足,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难以真正发挥。

从城乡地区差异看,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在城市政策靶向群体间更加明显,

表10 公共转移支付对不同受教育水平个体志向的影响(PSM-DID)

变 量	初中及以下	高中、大专	大学及以上
转移支付期	-0.170(0.136)	0.020(0.191)	-0.319(0.255)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2.263*** (0.609)	10.295*** (3.421)	-22.543*** (0.226)
常数项	0.617(1.677)	5.897* (3.146)	-2.016(3.617)
观测值	10932	5051	948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有利于缓解城市贫困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乡土理念、宗族文化和人情网络等对基层治理的影响更突出,不利于



表 11 公共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居民个体志向的影响(PSM-DID)

变 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农村	城市
转移支付期	-0.084(0.144)	-0.397*(0.241)	0.001(0.116)	0.111(0.142)	-0.246*(0.138)
实验组×转移支付期	6.700*** (1.742)	2.391(1.650)	0.435*(0.252)	0.263(0.215)	10.862*** (2.656)
常数项	2.464(1.611)	-1.958(2.852)	0.961(1.040)	4.732*** (1.580)	0.447(1.846)
观测值	9580	4539	2812	4438	12493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个体、家庭、地区特征。\*、\*\*、\*\*\*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政策的落实,受教育、认知和思想等自身客观条件限制,公共转移支付对农村群体的扶志效应难以充分激发,这表明未来扶志的重点仍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只有将扶志和扶智相结合,才能真正提升农村贫困人群的志向水平。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 年数据,通过面板固定效应、DID、PSM-DID 等模型对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进行研究,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个体志向的经济福利和主观福利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公共转移支付能有效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水平,且其扶志效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扶志效应在长期更加明显。(2)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进政策靶向群体经济福利和主观福利提升个体志向水平,即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经济约束,通过释放和提升政策靶向群体消费水平、增加其家庭资产投资水平提升个体经济福利,提高其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还可以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础上,降低政策靶向群体因贫困所产生的弱势感、自卑感、改变生活的无力感等负面心理压力,增强幸福感和社会信任,提升主观福利,发挥扶志作用。(3)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存在异质性。一是与民生性转移支付相比,生产性转移支付因具有普惠性、拨款直接到户等特征,存在一定的“造血”功能,扶志效应更强;二是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低收入群体、青年和老年群体、女性群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群体的志向水平;三是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突出,与农村地区相比,公共转移支付更能提高城市地区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扩大公共转移支付规模。公共转移支付规模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进行调整,在保障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基本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约束,释放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增强其风险应对能力,为其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目标提供可能。

第二,完善公共转移支付政策设计,优化公共转移支付结构。首先要提高生产性转移支付在整体转移支付中的比重,充分发挥其扶志作用。其次要根据贫困和低收入人群



的不同特征给予恰当的转移支付,可以通过设置针对女性的专项转移支付,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贫困群体设计不同的转移支付等,进一步强化公共转移支付对不同特征群体志向的提升作用。最后,可以实施有条件转移支付,对已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个体是否能继续享有该资格进行评估,将政策福利与个体行为挂钩,有效提升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水平,避免福利依赖。

第三,规范公共转移支付的实施。完善公共转移支付的发放、领取和使用,严格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监管制度,提高转移支付的瞄准性,增强政策的公平性,以提升公共转移支付靶向群体的社会信任、政策参与积极性和志向水平。

第四,加强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提升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要辅以配套政策支持,要进一步完善落后地区政策环境建设,改善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经济环境,提升文明风气,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将扶志和扶智相结合,为公共转移支付扶志效应的发挥提供必要条件。

#### 参考文献:

1. 边恕、张铭志(2021):《扶贫转移支付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2. 边恕等(2020):《农村贫困补助的瞄准精度、瞄准成本与减贫方案分析》,《人口与经济》,第4期。
3. 韩华为、高琴(2018):《中国城市低保救助的主观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社会保障评论》,第3期。
4. 洪名勇等(2018):《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7期。
5. 刘穷志(2010):《转移支付激励与贫困减少——基于PSM技术的分析》,《中国软科学》,第9期。
6. 卢盛峰等(2018):《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了吗?》,《经济研究》,第11期。
7. 苏春红、解垚(2015):《财政流动、转移支付及其减贫效率——基于中国农村微观数据的分析》,《金融研究》,第4期。
8. 石大千等(2018):《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9. 田勇等(2019):《“输血”还是“造血”?面向农户的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农业产出的视角》,《经济问题》,第3期。
10. 徐富明等(2017):《贫困问题:基于心理学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第8期。
11. 张蓓(2017):《以扶志、扶智推进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改革》,第12期。
12. 张跃平、徐凯(2019):《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特征及“扶志”与“扶智”的耦合机制建设——基于四川甘孜、凉山两州的调研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13. Asadullah M.N., Xiao S., Yeoh E. (2018),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2005–2010: The Role of Relative Income, Gender, and Loc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48: 83–101.
14. Bucheli M. (2016), Public Transfers and the Poverty of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Uruguay. *Poverty & Public Policy*. 8(4): 398–415.
15. Haushofer J., Fehr E. (2014),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344(6186): 862–867.

(责任编辑:朱 犁)